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古代史著 / 社会、人口、家族 /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绪论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绪论

2004-10-24 定宜庄等 国学探微2004-04-23, 旧版文章 点击: 925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绪论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绪论

作者: [定宜庄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6-6 15:51:41发布) 阅读292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辽东[1]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在清朝前期，这个人群曾是今辽宁等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主要的开发者和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居住者，清朝覆亡之后又崛起而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构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是东北从古代的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这是一个看似不大的题目，却涉及到东北史、清代移民史、人口史以及民族史尤其是满族史等诸多领域，我们也借助了历史学以外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探讨与研究方法的尝试都只是初步的，许多都有待补充、纠正与完善；有些问题仅仅提出来了，却没有找到答案。但我们相信这些尝试与问题的提出，能够给予同行们某些启发和兴趣，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多少起到推动的作用。

移民的活动与他们在定居地组成的社会是多种多样的。以往对移民史的研究，注重的多是移民的数量、迁移的路线、距离与过程等问题，这当然是基础性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移民从落籍到日后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在新居地形成的社会的格局，亦即不同的移民模式，尤其是不同模式之间的比较，还很少有学者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而我们却认为，后者不仅是对前者即移民数量等研究的必要接续，更是从事移民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清初较具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多起，其中山东向辽东的移民与湖广向四川移民和福建向台湾移民，可说是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较深远的三种不同类型。虽然它们的移民主体都是下层农民，但由于国家对不同地区的移民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迁移者的迁出原因和迁入新居地后的不同境遇，却使得这几处的移民活动呈现出各自相异的结果。为使读者对辽东移民的特点有更清晰的把握，我们先将这三种移民模式略作比较。

一，湖广向四川的移民

湖广亦即后来的湖南、湖北。此地百姓向四川的迁移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历康熙、雍正到乾隆初才告一段落。当时向四川移民的不限于两湖，陕西、广东、福建等省也有百姓进入，但以两湖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说。该处移民活动的特点，是受到清朝政府的大力鼓励。[2]

出于稳定西南政局计，清朝政府对恢复四川的经济一直寄予期望，频频采取措施，招徕外来百姓进川垦荒，并给予种种优惠。如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以“川省见在了遗，祖籍系多湖广人氏，”和川中每遭劫难，常“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为理由，请求清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处省农民落籍耕种。[3]十年（1671）清廷因川湖总督蔡毓荣的建议，决定放宽在四川实行的“招民授官”条令，又把开荒起科年限由三年延长到五年，还宣布“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4]二十九年（1690）清廷又针对外省客民害怕垦荒成熟后，有人指认故业，兴起讼端，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5]，并准许入籍子弟可一体参加科举[6]。康雍之际，两湖赣粤等省连续发生水旱灾荒，贫苦百姓为寻求觅食之所，携老带幼，纷纷流入四川，为了有所因应，户部

历史地理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于雍正六年（1728）议准了由该省巡抚宪德提出的按户授田方案，规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若一户内老少丁多不敷常赡者，临时酌增，俱给以照票，令其管业”。此外，政府还给每户银十二两，作为流民生活之需[7]。以后，清廷于雍正八年（1730）再次颁诏，放宽起科年限，定垦种荒田六年起科、荒地十年起科[8]，使移垦农民能确实安心农亩，不致因赋课而影响开垦成果。

清朝政府的招民垦荒政策，使很多进川农民得到实惠，特别是最先来到的农民，通过“插标”、“插业”的方式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后至者虽限制较多，但仍可通过向先期入川者佃田、低价购买或从政府方面分得一定的土地。在当时，只要有劳力，就不愁得不到土地，还出现了“力农致富”、“佃种起家”的富农和中小地主。有的史料说，“清雍乾间，湖南北人率沂江而上，徙家受田，不数传蔚为大姓世室者，所在皆有”[9]。总之，清朝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利于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地权分散，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势力活跃，并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这是四川移民社会最显著的特点。

在四川的移民过程中，虽出现过主与客、或此地客籍与彼地客籍之间的矛盾乃至争斗等事，但总的说来情况并不严重，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正如乾隆《罗江县志》所言：“猷逆戈兵之后，土著十无二三，多秦楚吴粤之人，开垦佃种，从前颇称难治，近时加劝谕，亦渐淳厚”。类似罗江的情况在其它州县也可看到，[10]甚至还有“虽曰客民，同于土著矣”[11]的说法。这应该与当地生活空间相对宽松，各方有较多的相互交流并互有依藉有直接的关系。

二，大陆向台湾的移民

大陆向台湾本岛的移民活动起于明朝中晚期，高潮却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12]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翌年（1684）台湾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到康熙中末叶，大陆的移民急速增多。虽然在清朝官方文献和其它各种资料中，迄未见有对大陆百姓向台湾移民的明确禁令，但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特别是五十三年（1714）以前，清朝政府对闽广沿海百姓渡海东迁，还是颇加限制，如禁止渔船装载货物、接渡人口，规定凡赴台者不许携带眷属等等，但“台湾地土膏腴，无业民人纷纷渡海觅食”，[13]合法请照既费钱又费事，所以偷渡之风一直盛行，甚至还有专门组织人偷渡的客头。

有人将台湾移民的分布概括为“泉海、漳中、粤山”，[14]渡台垦荒的移民中最多的还是福建人，其中又有漳州和泉州之分，他们到台后往往以原籍贯为中心，画地聚集而居。中期以后，随着移民人口增加和新垦地域的不断扩大延伸，人们为争夺土地、水源等资源而引起的矛盾也更趋紧张激烈。加上清朝统治者为了防范台湾兵民通同造反而制定的“班兵”制度，导致这些移民以原籍贯结群，常因小忿开启衅端，进而导致群体性械斗。“闽、客及漳、泉分籍而居，以及班兵防守非同籍民庄的两个现象，更激化不同方言群的分类意识，导致分类械斗的越演越烈，反而造成台湾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15]这是台湾移民社会一个重要特点。

在土地占有形式上，台湾也与四川不同。荷兰殖民者占领期间，台湾实行的是王田制度，土地所有权属荷兰东印度公司，劳动者便是王田中的佃户或农奴。郑氏军队进入台湾，改王田为官田，又实行军事屯垦，另外也有少量的文武官员田和私垦田。清朝统治时期仍保留了官田名目，但主要均属私田，同时因来台民众陆续不绝，官府把查勘出来的荒埔草地出示让有财力实力的垦户（业户或业主）领照开垦，再由他们招佃户开垦收租，所以土地一开始都垄断在垦户手中（包括单个领照和合伙领照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垦户取得土地的途径简单，在移民中有的在大陆就是拥有一定资产和有组织能力的地主、商人；二绝大多数土地是从未耕作过的生荒地，自开垦到成熟需要投放资本和劳力，如兴修水利等，须由有财力的垦户组织出资修建；三，有的土地得自于原住民，常常先由垦户出面，成片租典。由于佃户在垦荒中也多曾出力或投资，如合力开挖水渠，改善农田条件等，所以最早的佃户都拥有永佃权，有权处置田底租典，于是佃可再招佃户，出现一田多主的情况。永佃权和一田二主、三主，都是从大陆福建移植过去的现象，却在台湾得到了普遍发展。这与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构成社会主体的四川移民社会，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早期来台的移民中有很多是季节性迁徙的农工，他们于春初渡海过台，秋收后再返回家乡，称为“客子”，所居庄称为“客庄”，所以庄中妇女极少，导致当地男女性比例的严重失调。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诸罗县志》记载，该县“男多于女，有村庄数百而无一眷口者”。一个几乎全由光棍汉组成的社会，必然是畸形和不稳定的：“统计

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女之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合各府县之倾，则无赖群聚至数百万人，无父母妻子宗族之系累，似不可不为筹画者也”[16]。尽管在早期移民群体中，几乎无不存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但台湾移民社会仍属相当突出的。

三，山东等地向关外辽东的移民

对于山东等地向辽东的移民，[17]虽然屡有文章专著叙述，但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种移民模式研究。这里存在的最大误区，就是将从山东迁移辽东乃至东北各处的人口，一概当作汉人（即相对于旗人的民人）看待，从而使对清代辽东地区的开发、八旗制度的性质和清廷对流民的政策等诸多问题纠缠不清。本书初写时并无意涉及这些问题，即使现在也不敢说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完满解答，但是一旦理清了编入八旗的这个汉族移民群体的线索，却发现一些较为重大的疑团竟因此迎刃而解。

山东向辽东的移民活动，与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八旗官兵携带眷口奴仆倾巢入关落户京畿的行动紧密相随。根据史料记载，早在顺治三年（1646）第一批山东移民已到达辽东，以后便持续不断。他们中有的被官府强制遣去的，有的则怀着改善生计的愿望应招前往，当然也不乏冒险闯入者。辽东移民与其它地区最大的区别，在于清朝前期大多与驻防的八旗军队一起，被组织在八旗制度之内，从而成为与民人相对的“旗人”。虽然顺治十年（1653）清廷并置辽阳府，正式确立起八旗制和府州县相辅而行的双轨制统治，但府州县管理安置的主要是陆续迁来的流民，大量早期出关并定居的汉族农民既经入旗，其实是不受府州县管辖的。

清朝政府所以在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敞开门户接纳汉族移民，并将其大量编入八旗（直到乾隆年间仍有汉人被编入旗籍），是由辽东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的。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关外是自己民族的生身之所和聚居之区，也是满族后续力量之所在，有清一代一直被当作大后方。但从全国来说，关外又是地处偏远的东北边疆，它西接蒙古，东连朝鲜，尤其是16世纪以降由欧洲东进的俄罗斯势力已经从西伯利亚来到黑龙江畔，这些都凸显了东北、特别是关外政治经济中心的辽东在东北部边疆的重要地位。

基于以上缘由，清朝统治者既不能让辽东长期置于空旷，却又无法遣回业已进关的八旗劲旅。在顺治一朝以及康熙朝“三藩之变”（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期间，战争一直在进行，大局尚未稳定，况且拱卫京师的重任也必须仰仗八旗子弟。再则辽东还遗留着大批皇庄、王庄缺人耕种，许多差贡需人承担。将出关汉人编入八旗，一是作为甲丁充实驻防力量，二是成为内务府三旗佐领下人丁向皇室纳贡服役，三是充当官庄户丁，四是编充内务府和下五旗各大粮庄庄头、壮丁。在四种人中，数量最多的是第二种即内三佐领下人丁。康熙中，清廷对辽东八旗驻防进行了一次极具深意的调整，除保留金州水师营中的汉军八旗之外，余下均由满洲、蒙古和锡伯、巴尔虎甲丁承担。从此在八旗内部形成了满洲、蒙古等人丁驻防戍守，汉军旗人（包括内务府汉姓人）[18]则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格局。

移民一经入旗，就被束缚在严密的八旗组织之中，他们耕种的旗地在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人身也受到八旗制度的控制。这便构成了辽东移民社会与四川、台湾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他们的地缘组织无法发展，也就不可能从这一基础上生长自己的家族势力和任何民间组织；其次，一经入旗，就等于将自己与旗外的民人包括故乡的亲属之间划出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更遑论象台湾的“客子”那样来往于两地之间了。他们因此而成为辽东地区最稳定最安土重迁的一个人群。其三，清朝统治者也力图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使他们在思想文化上认同于旗人社会，如要求旗民不通婚、不交产，妇女不缠足等，以示与民人有别。甚至也不象其它移民那样可以随意以经商、从事手工业等各种手段谋生（在后期有所松动），这造成了他们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比其它地区移民有更多的整体性与一致性。辽东移民模式正是因此而构成与其它移民模式的本质区别的。

然而在辽东，既然同时并存着府州县体系，许多已入籍或未入籍的百姓也是由关内迁入，亦以山东、直隶为众，有的甚至还与入旗汉人存在着乡里或某种亲戚关系，在开荒、佃田或佣作、从事商贩活动中，与旗人也有一定的往来。乾隆五年（1740）清廷对关内流民出关实行限禁政策，又规定对业已出关尚未入籍者定年遣返原籍。为此曾有大臣提出：“其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五项之人，为旗民所资藉，势难阻禁”。[19]这种旗民交往频繁的大环境，常会唤起入旗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故乡的依恋亲情，自称“随旗人”，正是恰当地表示了他们入了旗，但又与满洲等正身旗人有别，介于汉人与旗人之间的边缘性的角色。

顺治十年（1652年），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并置辽阳府，在辽东正式确立起八旗组织和府州县相辅而行的双轨制统治方式，有关文献对这一地区民人和民地数量增长记载莫不详备，而误区也就由此产生，即一提到辽东的汉族移民，就认为是辽阳府以及后来成立的州县治下的民人，此说一直被研究东北地方史与满族史的学者奉行不替，而事实上，仅仅从清末或民国初年辽东的有关方志中，也可查找到足供参考的线索，那就是，即使在光绪朝以后东北地区实施放丈开荒导致形成一轮新的移民高潮，并使旗与民的人口数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后，旗人在各地所占比例仍然达到半数或半数以上，至少也超过三分之一。按据赵文林、赵淑君在《中国人口史》中的估测，19世纪末叶，奉天的人口约在500余万到550余万之间。[20]总体权衡，若旗人的人口比例占60%，而旗人中的汉军又占旗人总数的80%乃至80%以上，即以80%计，则旗人人口是300-330万，汉军八旗240-264万，在八旗汉军中，属于内务府三旗的人口，至少应超过100万，对此我们在正文中将予以详述。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辽东这一汉军旗人群体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在身份上，他们是旗人，拥有国家所赋予旗人的各种特权，可以凭借旗人的特权地位占有大量旗地，在经济生活中，比起只执枪荷戈，以披甲食粮为生的满洲、蒙古八旗要丰富活跃得多。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清统治者对其政治上的控制逐渐放松，他们又得以通过科举、捐纳任官授衔，而跻身于地方“有力者”行列。清末国家全面实施“放丈招民”以前，这些“随旗人”在辽东无论是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或是在政治、经济上的能量，都已不可忽视；而当清朝统治衰亡、满族皇室与王公贵族没落之时，他们又因为原本就是汉人，不但不致受到改朝换代后的歧视，更可利用固有的政治、经济实力，参与角逐并很快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东北地方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辛亥革命及其近现代东北史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令人奇怪的是，这样的一大批人，却悄然湮没在历史的尘雾中而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是个很值得探求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关内各省的驻防旗人不同。凡八旗驻防，都另居一处而自成天地，绝不与当地居民混杂，但辽东汉军旗人，尤其是内务府旗人，主要从事的是种地、植棉、纺线、养蜂、晒盐等经济活动，与后来移入的民人往往居于同村同屯，旗地与民地也犬牙交错，所谓“旗民不交产”的禁令也就无法执行得十分严格。加上很多入旗汉人与山东故乡始终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或者兄弟几人中有人入旗而有人仍在民，或者入旗之后又从老家带来亲族故旧而后来者就未曾入旗，或者入旗后又招徕民人为其佣工或伙种。尤其是所缴贡赋从实物改为折银之后，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更多，虽然辽东旗、民被分治于八旗与州县两套管理体制之下，但交通运输与市场运作却不可能完全受体制的控制和影响，这一则使入旗者很难忘记自己固有的汉人来源与身份，二则也容易使他人产生错觉。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史家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字材料，尤其是官方文献对当时制度的记录。而辽宁省的这些文献，却一再为研究者带来错觉。究其原因，一是旗人户口一向单独入册，不在当地官府掌握之内，而当今人们常见的清代册籍中，对驻防兵额与旗地的纪录已经过于简略，更遑论对内务府各种应差人丁和具体人口数字了。以致人们一谈辽东或东北移民，就把文献中对各州县厅的记载作为凭依之据。二是从作为研究当地情况的重要文献即方志来看，清朝撰写的方志并不涉及旗人尤其是内务府旗人之事，进入民国之后，由于大量汉军旗人与民人本来就难以分辨，加之他们中绝大部分在辛亥革命后都隐瞒了自己入旗的历史而改报汉族，撰写志书的人或因自己的民族立场，或因对历史脉络的无知，便将这批人都划入汉族之内。而后来的研究者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整理史料、探索史实的结果，是以讹传讹，最终使这批人几乎消失。乃至当我们面对记载了大量人口的户口册时，一度茫然无措，竟不知应该从何做起。

二

近年以来，对中国历史人口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兴趣和关注。这一新领域的开辟，以计算机技术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为前提，使很多以传统史学方法难以运用的资料纳入史料的范围，这不仅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视野，在所获结论的准确性、可靠性上，也较前跨越了一大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中较著者，如刘翠溶在《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一书中使用了大量族谱资料；[21]李中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论文集，[22]则将清代皇族的《玉牒》[23]作为统计资料的主要来源等等。然而族谱之外，还有更浩繁、更丰富的可用作人口统计资料的来源存在，清代旗人的户口册就是其中之一。

清朝是由满洲贵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满族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统治的基础和支柱，也与这个政权的统治相始终。为了加强对八旗人口的控制，清代建立了严

格的人口登记制度。史称：“八旗壮丁，岁有增益，立法编审，最为详密。国初定：八旗新添壮丁，每旗编佐领三十，有逃亡缺少者，于诸王、贝勒、贝子等府壮丁内，拨补足额，仍将该佐领治罪。嗣后每三年编审一次。”[24]三年一比丁，每次比丁时都需详记有关的人口及其家属的出生、死亡、婚姻以及族与家庭组织等各方面情况。遂使这些带有连续性的户口册，成为研究人口行为不可多得的材料。

清代毕竟是距今很近的朝代，遗留下来的户口册种类繁多。今存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八旗名册、家谱册、户口册，存于辽宁省档案馆的盛京内务府户口册等，均为其牵率大者。而保存最多且最完整的，首推内务府各机构所属人丁的清册，八旗都统衙门所辖的八旗人丁户口册则散佚严重。仅仅盛京内务府的各种清册，据佟永功先生在《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一文中的介绍，就有3600余册，除小部分破损外，大多完好无损，[25]共登记了有清一代近300年大约100余万各种不同种类不同身份的人口情况。[26]

最早注意并利用这些册子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当属美国的李中清、康文林等人，1984年发表的*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 1774-1798*一文，就是以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中较为完整的一种——道义屯人丁户口册提供的人口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十余年后他们又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农村的命运与幸运——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行为，1774-1873》一书，[27]在历史人口学界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和影响。

然而，这种研究尽管别开生面，毕竟还只是开始，已有学者对李中清的研究提出批评，认为：“户口册的编审有其目的，必须了解它的用途之后，才能知道可靠性如何，决不能贸然拿户口册来研究人口问题”。[28]并具体指出：“李中清等人对于人口研究虽有独到之处，却对汉军八旗人丁的身分交代不清楚。”这确实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里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两个：第一是户口册本身的缺陷。当户口登记主要是用来征收差役和租税的时候，与此无关的人口便被忽略，譬如当朝廷停止从盛京内三佐领及管领壮丁之家挑选女子应差之后，原有关于女儿的记录在部分与之相关的册子中就消失了；[29]当差丁由丁应差改为以纳银为主之后，原册中有关人丁残疾状况的记录也就不见了。且不说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丁被有意隐匿。具体进行登记的人员也会因粗疏、不负责任而出现种种错误。因此将其作为讨论生育与死亡的资料往往存在陷阱，甚至很不可靠。[30]第二，无论户口册登记的人口情况有多么完整和详细，也无无论它的卷帙有多么浩繁，但只要我们不了解它所登记的这个人群的来源、民族，不知道他们的背景，以及在这个背景下特定的人口行为，那么这些按年月按人户记录的千篇一律的出生、死亡、嫁娶时间等统计资料，其价值就只能囿于人口统计学的有限范围之内而无法作用于广义的历史研究。而这些背景却正是户口册本身不可能告诉我们的部分。

所以，仅仅依靠户口册来研究人口问题确实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大量相关资料加以搜剔剖析，以作为对户口册的解释、补充和参照。这也就是说，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将这些具体人口与户口册衔接起来的环节。而其中第一步，是要了解户口册记录的，是哪一个具体的人群，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

清代内务府的户口册比不得清皇室的《玉牒》，所涉的内务府以及相关人口，其制度、机构和性质之复杂，早在清末就已难于分辨，并因此引起过无数纠纷。如今更是清史、满族史研究中最混乱不堪、歧义纷繁的难题。其中又尤以对诸种人丁身分的解释上，存在的误解和空白为最甚。而这恰恰是以户口册为据进行人口统计和研究所不能避开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们这个研究项目，最初就是围绕户口册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按照史家通常的研究程序，题目的选择总要根据史料记载是否足够来决定。但从户口册出发所做的这一工作，却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定寻找户口册所记人群的时候，并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去找，也不敢确定能否找到揭开谜底的史料。这就使我们的研究，比起一般的史学研究来，具有更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清代盛京土地，分旗地、民地和庄园地多种，同为内务府的土地，不同的庄、园，又分由不同的司管辖，并零星散布在不同地区；而同一地区，又往往是民地、旗地、官庄、皇庄乃至不同统属的王庄土地犬牙交错。这就使我们在辽宁省的调查，对象不可能十分单纯。户口册所记人丁有限，但通过调查接触到的实际生活却复杂而丰富。我们从无论文献、档案还是田野调查中所得的成果，也就不可能囿于户口册要我们解答的问题，因而本书所涉的几个专题，往往也超出了户口册所限的范围。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从户口册入手”，意即在此。

东北旗地和庄园的性质、内务府属下人丁的身份、东北的封禁与移民，这些都是多年来清史与满族史研究中特别关注的课题，整理出版的档案材料及研究论文乃至专著连篇累牍。但是，偏偏也就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特别多的空白和盲点，学界投入的热情与所获的成效往往并不成正比。我们着手这一项目，本来无意全面触及这些问题，但由于入手的角度与以往研究有些不同，也就有了些新的心得与收获，也许会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某种新的思路。

三

我们这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是在中国与美国两地双管齐下、分别进行的。在史学传统的文献研究基础之上，我们还根据各人之所长，调动每人在探索史学与其它学科结合问题上多年的积累和经验，借鉴了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史料介绍

作为史学家，我们的第一个途径，当然是从有关的文献史料着手，但收集和利用的范围都尽量扩大，不仅包括清代留下来的官书、笔记、方志、族谱、朝鲜史料，也包括辽宁档案馆所藏的大量地方档案，同时还注意到以往较少有人利用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官方文献

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分而为二，不相统属。这一机构的组织与行事，在清代“以无关外廷，与宫史皆秘而不宣”，以后虽有专门记载这一机构的《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传出，载录了内务府各机构所司事务及有关掌故，号称“宫中之事，钜细毕具”，但因其成书时间晚，所述内容又简略，从中很难了解内务府的源起、性质与全貌。[31]其它如各种版本的《大清会典》及事例，如清三通等书，虽较前书略为可用，但对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之间存在的统属又不统属、相同又不等同的关系，以及其间的因革损益，记载仍显笼统。至于《八旗通志》初集与续集，详备可用，记事却只到乾隆朝为止。

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记载的人口都居住于辽东。清代辽东地区旗民交错，土地制度复杂，人口类别和登录制度同样复杂。而该地区汉文化基础本来薄弱，满族作为一个重武轻文的骑马民族，早期的文字记载更是十分缺乏。加上明清（金）之间战争的破坏和清军入关之后相当长时期内无暇顾及东北的文治，以致有关东北地方的典章制度、文书谱牒都无法与关内诸省相比拟。[32]即以治地方史者不可或缺的方志为例，乾隆朝设馆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从全国各地征集方志，作为清朝“祖先发祥之地”的东北，竟无一部入选者。此前所修的几部《盛京通志》也都被乾隆帝批评为“叙事简略，体例亦多未合”，[33]而下诏令军机大臣派员重修。但这部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的修撰仍不尽人意，正如有人指摘的：“良以清代修书时，于明代事多涉时忌，宁弃勿取，即求之元代以前、明代以后，亦复多所漏略”。[34]而从明至清辽东土地人口的演变，却正是我们这一题目的研究起点。加上此书修成之后百余年，竟再无一部系统记述盛京事务的通志问世。始修于1927年，印行于1934年的《奉天通志》虽然认识到：“乾隆以后阅百余年，一方事迹文物漫无方策可稽，久之将日就湮灭，有心君子讵可忽诸不廛”，[35]但终究还是更详于近世，遂使乾隆末到清亡一段时间的许多问题都是空白。

至于辽东各府厅州县的志书，据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的统计，除去省志不算，现存169部。其中康熙年间（康熙十六至二十四年，1677-1685年）纂修的仅10部，咸丰七年（1857年）仅两部（岫岩、开原），光绪二十八年到光绪末年（1902-1911年）共修45部，此外还有一部《塔子沟纪略》（属今朝阳市，地在清朝时的柳条边外）为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修。其余就都是宣统和民国以后修撰的了。康熙朝志书都非常简略，咸丰、光绪已是清晚期，对清代前期制度不甚了了，何况即使如此，在全部志书中也只占少数。可以说有清一代，许多应为辽东方志记载的人事变迁几乎为空白。方志难以弥补官书的偏差，是又一处遗憾所在。

不过即使如此，这些文献仍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够对有关制度的全面概貌，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是我们研究的入手处和基础，对整个项目的开展起着导航的作用。

2，档案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内容十分丰富，户口册其实就是这些档案中的一种。除此之外，有专记盛京内务府事务的黑图档，有对近代东北历史记载特详的奉天行政公署档。而利用尤为便利的，是从各地县调上来的地方档案，其中仅盖州行政公署档案，就有两万多件，这正是我们把盖州选为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重点的原因之一。囿于人力、精力与财力，我们查阅到的，还只是这些档案中的极少一部分。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官方文献作向导，面对卷帙浩繁的档案只能望洋兴叹，乃至挂一漏万，出现诸多盲点。但与官方文献、户口册以及其它史料结合后，再从档案中作深入发掘，则是这一问题能否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除去这些原始档案之外，经近几十年整理翻译并出版问世的大量档案包括满文档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的方便，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93）、《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93）和散见于《历史档案》及其它各种杂志的材料等等。可惜由于历史和政治等方面原因，学界多年来的研究热点多集中在“庄”与庄头、庄丁的身分上而无暇它顾，遂使相关档案的整理出版至为繁细而其它材料却多被冷落，只好仍从原始材料中爬梳清理。

3. 私人著述与族谱

清代东北，用方志中常用的话说，就是“风气晚开，习惯朴塞，原无学术之可言”[36]，文化底蕴既谈不上深厚，又缺少中原常见的那种以诗书礼义传家的源远流长的世家大族，相应也就很难觅得研究汉地社会史时常可据的文人笔记、年谱。至于中国民间最常见的传世文献——族谱，无论数量和水平，都远远不能与中原尤其南方诸省相比，这从有关学者的利用、研究以及各图书馆收藏的族谱目录一望便知。但是，研究清代东北旗人的家族和人口，除了户口册以外，族谱毕竟是最直接可据的材料。对同一研究对象，如果能有户口册与族谱的两种记载互作补充参照，是很理想的事。

散布于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家谱因有目录，查找堪称方便。近些年来，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将我国许多大图书馆所藏家谱制成胶片，更为检索提供了莫大的便利。[37]几年间，我们查阅了北京及辽宁等处各图书馆以及美国犹他家谱协会收藏的辽宁省各种家谱，为数虽然有限，毕竟给予我们一些从其他记录中无法觅得的有关我们研究的人群的信息。此外自八十年代以来，辽宁满学界的学者在搜集满族家谱方面颇有成绩，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和介绍的著作，其中少数家谱也被结集出版。但遗憾的是，其一，这些家谱中得以整理出版的不仅是少数，而且有些还是片断，对于我们已是二手材料，何况更多的还是这些学者的介绍材料，已是三手、四手，其可靠性已打了几折折扣。其次，在这些谱书中与我们想要了解的盛京内务府属下人丁有关的仍属寥寥，至少，我们没有发现一部可以与户口册直接印证。这就使我们将亲自前往该地区寻找家谱，作为我们这项研究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4. 朝鲜史料

满洲兴起早期，生活地区常跨越中朝两国边界，后金政权建立后更与朝鲜李朝当局有许多政治、军事及经贸接触。对于这些接触，朝鲜史籍多有记录，其中以《李朝实录》保留最多也最系统。由于它们使用的均系汉文，对我们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5. 社会历史调查材料

辽东地区的典籍虽不丰富，但也有得天独厚之处。近百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使辽东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地区，因而有关该处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历史，曾有过由官方出面组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不止一次的完备详细的社会历史调查，并留下了大量调查材料。其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有两次，一次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等机构出面组织出版的一系列调查材料。另一次，就是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当时日本学人的调查，目的固然是配合日本政府对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和征服，其着眼点与角度也不同于单纯的学术研究，调查重点在经济情况和土地制度，尤留意于清廷留下的皇庄、官庄和王公庄园，[38]但其殚心竭力的认真态度，具体入微的调查结果，以及雄厚的财力支持，确为一般调查工作所不及。其中如《满洲旧惯调查报告》前篇的“内务府官庄”、“皇产”、“蒙地”、“一般民地”；后篇的“押”、“典”、“租权”，既集中了清代志书中对有关制度的记载和当时档案与报刊的材料，并有相当比重的实地调查报告。[39]再如《农村实态调查一般调查报告书》[40]和《满洲家族制度惯习调查》等，都成为我们这一研究中重要的背景资料。

1956年开始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进行的。这项调查得到当地各级政府的积极协助以及资金、时间、人员和设备各方面的保障，前往各民族地区的调查组包括了历史、民族、语言、考古和艺术等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其参与人数之多（前后参加调查的人员多达千余）、调查地域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属空前。虽然囿于当时政治环境而带有种种局限，但对各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作为其中之一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也由此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调查笔记和搜集的各种文献资料，成为此后几十年满族史教学和研究的依据。然而尽管如此，为数甚巨的这些资料，多年来却很少受到研究东北史学者的开发和重视，原因之一，是经反复整理修改，作为“民族问题三套丛书”出版的《满洲社会历史调查》一书，[41]已失去了本来面目，民族学家与历史学家对此已提出过尖锐的批评；[42]之二，调查留下的多达几十册的手稿，迄今未经很好的整理。其中许多因出自未受过民族学与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人之手而不够规范。加上仅此一份，借阅困难，使研究者难以对其细细搜检。承蒙有关学者的协助，[43]我们翻阅了全部手稿中的调查记录，其中留下了几十年前当地人员有关族源、迁移的口述，以及抄录的部分碑文和家谱，这些东西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难以见到并无法复制，虽然利用时要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

二，田野调查

即借鉴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方法，以户口册提供的地名（村屯名）和姓氏为线索，亲自前往当地，寻找户口册所记人们的后裔，了解当地人们的社会与生活状况，探询他们对于往事的记忆。事实上，早在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就曾有过与民族学家合作参与调查与撰写报告的经历，对于史学与民族学方法如何结合、尤其是田野与文献如何结合的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与摸索，[44]本书的调查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种摸索的延续。

我们的这种田野调查，在做法上与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有诸多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一，不是以观察和描述现在的生活为主，而是通过活人的回忆去追溯过去的历史；二，这种追溯，是在我们掌握的户口册与文献基础之上进行的，将其称为“核对”更确切些。三，即使是做口述史，其实也是在从当地人口中寻找对散佚文献的记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的历史。这些做法也许会引起争议，但对于要达到的结果，却最简捷有效，我们也从中获得了仅仅从文献中难以获得的大量信息。

1998年迄今，我们几度前往辽宁省的盖州、海城、营口、法库、开原、铁岭、新宾、怀仁和本溪等市、县的近百个村庄，访问了百余名老人。其中如盖州一地，我们就曾去过4次，在上至辽宁省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下至市县镇（乡）、村干部的帮助下，走访了在“盖州人丁户口册”的记载上所有人口超过千名的村子及在册子上有名的辽北诸多村屯。对有些村子和老人，我们还访问过不止一次，所获成果还是不错的。三年来，我们过眼的满、汉和朝鲜族各种谱书原件及复印件不啻二百来部，其中仅从私人手中搜集到且从未公开过的就有数十部，还有谱单数十份，碑文若干通，以及大量保存在村民记忆中的祖先的世系和故事。仅从谱书论，其总和就几乎超过了各大图书馆的收藏，说明即使在辽宁这样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基础薄弱的地区，只要肯用心下力去挖掘，仍然可以从民间获得大量有价值的史料。这些民间谱书与碑文为本书填补了大量官方史料缺载的空白，成为户口册之外本书依据的最重要史料，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亲往一地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生动的背景材料，加深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了解，而且这些人的后代对于自己祖先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和评价，本身就是我们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况且这些调查，都是与对户口册进行整理统计以及翻阅各种文献史料的工作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文献中发现问题后试探着到田野工作中寻找答案，在田野工作中出现疑难时设法再从文献中想法解决，几经反复之后，才有了如今这样一个阶段性成果。当然，在这一收获的后面，是出现了比以前更多的一连串的疑问。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正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

寻找户口册背后所藏的人口，是一个艰难但也充满乐趣的过程，其中官方文献、档案以及田野调查，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从这三个途径入手，是我们近年来致力进行的尝试，我们期待着这种尝试，对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的解决，在内容和方法上都能有所突破。费孝通先生几年前说过：“今后在微型社区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45]或可理解为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获得的一点感悟？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合作，目前虽已为人类学家所推重，并因此而产生了“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学科，但关注并进入这一领域的史学家却不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使这一领域的探讨引起各种学者尤其是史学家的重视，并使这种合作成为一个趋势。

前面提到，历史人口学这一新领域的开辟，是以计算机技术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为前提的。将户口册提供的大量资料转换成可为电脑识读的文字、数字及代码，即建立电脑数据库的工作，美国一方早在十余年前即已开始，经十余年反复的艰苦摸索，在耗费了庞大的精力、人力与金钱之后，终于积累了成套的丰富经验并有诸多发明创新，如今仍在这一领域居于前沿地位。数据库的建立不仅使我们得以据此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找到有关这个人群人口行为的特点和规律，也为日后人们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利用，提供了永久性的方便。

迄今为止，我们已将这批户口册的大约五到十分之一输入电脑，计有50万人次10万个人的材料，并作了有关这批人婚姻、生育和死亡、病残等人口规律的整理和统计。本书中大量的分析表格，就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成绩。与传统治史方法相比，这种在几十甚至上百万的人口数字基础上做的量化分析具有明显的可靠性和优越性，因为从各种史书中爬梳出的案例数量毕竟有限，难免以偏概全，方志中对当地风俗的描述又往往失之空泛，常有陈陈相因甚至夸张不实之弊。

本书所附各种统计图，也都是根据数据库提供的大量统计制出的，它比传统的历史地图制图法更准确更清晰，不仅能够使一些单凭文字叙述和表格统计难以呈现的情况凸显出来，使人对研究对象获得整体性的把握，还能使某些在一般文字叙述时不易发现的问题变得突出，从而引发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兴趣。

总之，这种跨越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学科的相互合作，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尝试，它使我们得以互相启发、互作补充，克服单方面研究难以逾越的各种片面与局限，拓宽了观察问题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层面。而尤为重要，这使我们的研究，在对相当大量的个案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又能突破文献记载的零星散乱、个案调查的只及点不及面以及人口统计的抽象，将点点滴滴所得由点及面地加以贯穿，并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将其融会贯通，终于使我们研究的这段历史，能够作为一个整体，鲜明而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